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法国社会理论

French Social Theory

[英] 麦克·甘恩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法国社会理论

[英] 麦克·甘恩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31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社会理论 / (英) 麦克·甘恩 (Mike Gane) 著;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ISBN 978-7-301-18667-1

I. ①法… II. ①甘… ②李… III. ①社会学—研究—法国 IV. ①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365 号

© Mike Gane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transmitt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Mike Gane 2003.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Sage Publications Ltd 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 法国社会理论

著作责任者: [英] 麦克·甘恩 著 李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667-1/C·06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60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vii>

过去两百年来,法国社会理论不断发展,本书叙议结合,别求新声,期望和读者一起重新思考这股传统孕育出的一些重要话题。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其他种种,与这些术语关系最密切的,或许莫过于这股传统。说到底,正是这股传统,提供了利他主义(altruism)、失范(anomie)、超终局(hypertelia)这些术语,当然还有“社会学”这个词。本书力拒陈见,大胆提出,如果基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再要简单将法国思想当前的这些关注话题直接回溯到康德,就是忽视了1800—1880年间这段法国社会思想充满重大创新的时期。一些眼光极为敏锐的评论者已经指出,法国现代社会理论受到之前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后者又受到之前涂尔干和莫斯式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引导,再往前看,则是孔德学说和乌托邦社会主义^[1]的身影(例参Dews, 1987, p.244)。因此,本书行文议论不求全面穷尽,只打算在讨论社会理论时,凸显其研究主题,让视角更具长远历史感。为此,我在书中重新解读了有关理论阐述较早周期的著述(参看Ray, 1999; Shilling and Mellor, 2001)。

一 法国社会理论

本书认为,无论是体现孔德和涂尔干的影响,还是反映马克思(和韦伯)的思路,社会理论的主线其实都是圣西门主义者在1815—1830年间确立的共同主题的变体。一方面是孔德的三阶段法则,强调文化上的现代性和科学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社会进化图式,展现从封建制到现代工业的阶级剥削模式。至

[1] 乌托邦是本书关联诸多思潮和人物的重要概念,为统一理解起见,不采用“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略带贬义的传统中译。另本书凡不注明“原注”者皆为中译者注。

于这一主题所指向的现实，就是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充满悖谬的得失成败，以及随后难以捉摸的社会政治危机。人们常常追问：革命时期何时终结？晚近右翼政治思潮东山再起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原因就在于，尽管让大革命青史留名的是共和派立场的《人权宣言》，是“平等、自由、博爱”的吁求，但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种极端化形式所导致的思潮，落实到现实层面，却超出了民主的政治形式。这些乌托邦思潮还关联着一种特别的自由观，它承诺要超越形上性的自由主义：所谓自由 (liberty)，就是基于妥当的知识而具备行动的自由 (freedom)。因此，在法国传统中，才有可能接受某种激进主义，要么是左翼激进主义，要么是右翼激进主义，以对抗被简单界定为“资产阶级”或属于英美文化的异族特性的民主形式。孔德的社会学和“社会统治”(sociocracy) 对左右翼传统都产生了影响，无独有偶，涂尔干的社会学对左翼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也都有所激发。故此，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研究法国传统的漫长历史，在今天依然颇有教益。

本书主张，自 1800 年以降，社会理论出现三轮周期，并以此谋篇布局。完全有理由说，我这样来安排素材，反映出偏向于一种特定的周期模型，以宗教冗余 (excess) 阶段为终结，是为解体环节。另有观点认为，这个充满宗教情怀的时刻其实标示着另一个周期的肇始。更有人觉得，鉴于我只是挑了少数理论家作为重点考察的样本，推动理论发展的社会主导潮流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幅面貌。对于这些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反驳。在本书中，我只想解读三个时期中主要的社会理论。而这三个时期也符合另两种时代划分。一是孔德本人提出的分期说，因为我所提出的时代划分，不过是延续了他在奠立社会学时发明的那种。二是法国社会历史本身的政治分期：第一阶段是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式，从 1800—1879 年，也就是第二帝国的覆亡；第二阶段是第三共和时期 (1880—1940 年)；第三阶段则跨越了第四共和与第五共和，直至今日。这两种时代划分也都面临质疑，尤其是第二种。不妨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具有决定性的断裂。但也可以说，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 70 年代中期，法国历史经历了一段极为跌宕的时期，独具特色。这些别样的看法也都不无道理。我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只是因为采取了特定的叙事结构，反映了支撑我的分析的根本命题。如此推进分析，更彰显出法国理论已经不止一次地重生。本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揭示这种传统通过哪些错综复杂的方式，反复更新。

然而，什么是社会理论？我在本书中的立场是：一端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直至社会学（以及各门社会科学），另一端是以社会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为取向的哲学类型，社会理论就是这两端之间的地带上一类相当独特的思想（参看 Lepenies, 1988）。不妨称之为“第三文化”或“第三知识体系”（third curriculum），与其他两种文化截然不同（参看 Zizek, 2001, 第五章；Serres and Latour, 1995, p.184）。有关精神分析、史学、文学、哲学和认识论，这些相邻领域我都有所涉及，只是没有深入考察。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只有非常间接的考察。有必要指出，在法国，当此之时，对于“理论”作为一种书写体裁的观念，并不像在英语文化中那样普遍认可（“以我对法语的理解，‘理论’这个词听着很怪异。”[Leclercle, 2001, p.36]），哪怕从阿尔都塞到布希亚，众多法国思想家都曾撰写过专门探讨“理论”的名作。尽管利奥塔等法国理论家也曾写过一些界定何谓“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但在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参看 Descombes, 转引自 Yamamoto, 1998, p.464）。比如说，布希亚不久前就曾指出，“如果说不存在任何涵括一切的对于世界的表征，能够赋予世界某种意义，那么也不可能有一种科学会成为破解整个故事的钥匙”（Baudrillard, [1997] 1998a, p.34）。本书就是要考察一股特别的传统，它努力挑战把理据押在单一理论叙事上的普遍历史。

如此一来，本书的写作就面临某种悖论。一方面，我长期浸淫于法国社会理论，自认在相当程度上受此影响，所以不能算是一位纯粹的看客。另一方面，对于今天的法国理论家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法国社会理论”。

二 文本说明

如前所述，本书的讨论并不打算全面穷尽，这就意味着许多重要著述没有得到评价。书中讨论了不少思想团体与流派，但我有所克制，没有开列它们的成员名单。针对思想家个体，现在有许多专门的参考书和研究，但本书并不是对这类材料的综合处理。我试图通过一些重要代表作来讨论重大思潮，希望做出的选择尽可能特点鲜明。我尽量依照法文原典核查各种译本，在一些理论要害处做了修正。相关书目原本可能极其庞杂，我也做了删减，只保留基本参考文献。

致 谢

我要感谢许多以不同方式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们。致谢名单必须分成三部分，分别针对孔德—利特雷，涂尔干—莫斯—巴塔耶，以及萨特—布希亚。

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诸位同仁及众多学生皆曾参与讨论本书有关法国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我从中受惠良多。我曾在一些大学院系和国际会议上宣读有关孔德的论文，特别要感谢参与以下讨论的同行们：1994 年兰开斯特大学的讨论会（尤其是斯科特·拉什和拉里·雷伊），1994 年牛津大学涂尔干研究中心举办的孔德社会学研讨会，莱斯特大学的论文宣读（尤其是特里·约翰逊、萨里·韦斯特伍德和大卫·艾什顿），1998 年苏塞克斯大学举办的研讨会（尤其是安德鲁·沃尼克、查尔斯·特纳、罗伯特·法恩和彼得·瓦格纳），伦敦举办的康吉翰研讨会（尤其是保罗·拉比诺、弗朗索瓦·德拉波特和迈克尔·林奇），以及伦敦举办的经济与社会讨论会（尤其是王斯福）。我要感谢《文艺复兴与现代研究》(*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富于效率的编辑科林·海伍德，以及负责组织上述后两次伦敦会议的《经济与社会》杂志的编委会，尤其是贝弗利·布朗、马克西姆·莫利纳、托马斯·奥斯本、阿里·拉坦西，尼古拉斯·罗斯、格拉汉姆·汤普森、托尼·伍迪维斯、弗兰克·皮尔斯、塔拉尔·阿萨德和萨米·祖拜达。我还要感谢 1998 年巴黎举办的两次奥古斯特·孔德诞辰两百周年纪念会的一些与会者，以及 2001 年在 Cerisy-la-Salle 举办的孔德研讨会的与会者（尤其是让-米歇尔·贝特洛、米歇尔·布尔多、朱丽叶·格朗热、约翰·海尔布伦、安格勒·克雷默-马里耶蒂、安妮·珀蒂和玛丽·皮克林）。我参考了下列论文：“孔德的社会学开场”（“Comte's Inaugural Sociology”，Centre for Critical Social Theory, Sussex University, 1998）；“形而上学阶段及其内部分期”（“L'état métaphysique et sa périodisation interne”，Comte Colloque, Cerisy-la-Salle, 2001）。

1990 年以来,设在牛津大学的英国涂尔干研究中心举办了多次研讨班和会议,主要组织者是 W. F. S. 皮克林。1990 年的首次系列活动后来结集出版,即《涂尔干问题争鸣集》(*Debating Durkheim*, W. F. S. Pickering 与 H. Martins 合编, Routledge, 1994), 随后又针对涂尔干的核心作品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有关涂尔干学派作品的会议包括“涂尔干与欧洲”(“Durkheim and Europe”)和“社会病:世纪末与涂尔干”(“Le Malaise Social: La Fin de Siècle et Emile Durkheim”)。牛津该中心还从 1995 年开始出版年刊《涂尔干研究》(*Durkheim Studies*)。我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会议和研讨班上宣读过一些论文,还要感谢比

<xi>

尔·皮克林、埃米尼奥·马丁斯、威利·瓦茨·米勒、约瑟普·罗贝拉、肯·汤普森、苏·斯泰德曼·琼斯、麦克·霍金斯、尼克·艾伦、克里斯蒂·戴维斯、罗伯特·帕金、温迪·詹姆斯、乔弗里·瓦尔福德、大卫·加兰德、菲利普·梅勒、克里斯·希林、德雷克·罗宾斯、爱德华·迪利亚吉安、杰克·海华德和菲利普·贝纳尔。我还在 1995 年于波尔多举行的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一篇论文,感谢会议组织者查理-亨利·屈安,特别是让-米歇尔·贝特洛、菲利普·斯泰纳、亚历山大·戈夫曼、杰弗里·亚历山大、克劳德·雅沃和屈安的讨论意见。

至于我有关萨特、巴塔耶、康吉翰、阿尔都塞、福柯、利奥塔、布希亚等当代理论家作品的讨论,还要感谢克里斯·罗杰克、乔治·瑞泽尔、罗伊·博伊恩、克里斯·特纳、大卫·梅西、加里·格诺斯科、保罗·赫加蒂、乔治·撒赖默罕默德、西蒙·克里奇利、安德鲁·沃尼克、基思·安塞尔-皮尔森、约翰·马克斯、玛利亚姆·弗雷泽、马库斯·德尔、大卫·斯莱特、理查德·史密斯、大卫·特夫斯、安德鲁·本杰明、让-米歇尔·贝特洛、威廉·波利特、威廉·梅林、彼得·吉本、尼古拉斯·楚尔布鲁格、斯蒂夫·布朗和约翰·阿米太奇。

最后,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给予本项研究的协助:莫妮克·阿诺、安德鲁·沃尼克、侄子尼古拉斯·盖恩,以及赛智出版集团的审稿人,特别是克里斯·罗杰克。上述各位都以不同方式帮助我进一步理清和打磨想法。但归根到底,任何事实硬伤或解读谬误均由笔者本人负责。

麦克·盖恩

2002 年 5 月

目 录

自 序	3
致 谢	6

第一编

第一周期：1800—1879 社会理论的诞生：利他主义

第一章 后革命时代的虚空	3
第二章 牺牲性的理论与现代性的社会学	12
第三章 理论在危机中：宗教与主观范畴	29
第四章 第一周期的终结：学院风格	43

第二编

第二周期：1880—1939 社会理论的首次重生：失范

第五章 社会理论重生	53
第六章 法国社会：没有规范的先锋	67
第七章 方法的危机与《自杀论》中对理论的求助	82
第八章 第二周期的终结：人类学与宗教	95

第三编

第三周期：1940—2000 社会理论的二次重生：超终局

第九章 存在主义学说	115
第十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	128

第十一章 从病理学到规范性..... 141

第十二章 结构主义理论..... 155

第十三章 激进理论与社会范畴的终结..... 173

第十四章 周期之末：对抗策略的时代 184

第四编 终 结

结语 社会终结时代的社会理论..... 203

参考文献..... 219

中外人名索引..... 229

中外术语索引..... 233

第一编 <1>

第一周期：1800—1879

社会理论的诞生：利他主义

19 世纪哲学史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幕，
就是实证哲学的莫立……如果不算笛卡尔学说，
整个法国哲学史上再无更为重要的事件。

—— Durkheim, 1962, p.142

第一章

后革命时代的虚空

这种旷日持久的无政府状态……人类在其中纷争不已，似乎让一些思想家忧惧万分……而对我们来说，问题已经解决。

——Bazard, [1828] 1972, p.3

1815年，纵非全体法国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出，眼前的社会面临挑战，需要从一片虚空之中重新构建，没有任何模型和学说可供凭依。有些人并不摒弃以革命为目标，遂求诸另一场革命：科学革命，来理解眼前的社会。他们力求基于一种新型知识，构建新的社会、新的道德与新的政体，而要创造这种新型知识，就得应用科学方法。这些观念经由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后果。而马克思主义又接受、改造并传播了圣西门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圣阿芒·巴札尔有部作品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脉络做了清晰概括，只是今天少有人知。1832—1834年间，一群女性圣西门主义者创办了史上第一份女性主义杂志：《自由女性》(*La Femme Libre*)。我在本书中考察的社会理论第一周期，大致可以界定为1800—1879年，即大革命之后的数代人，包括孔德与利特雷。他们所面对的法国社会，从第一帝国到第三共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建问题。

一 背景

现代社会理论非常清楚黑格尔的名言“凡合理皆存在，凡存在皆合理”(Hegel, 1952, p.10)。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这段出自1820年的声言，最好理解为是指1806年的欧洲，那是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欧洲，随着“拿破仑在整个欧洲传播大革命，将世界转变成一种具体的普世性”，启蒙运动“如奇迹般降临”，

逐步实现 (Althusser, [1947] 1997, p.145)。阿尔都塞出色地刻画了拿破仑帝国在 1814—1815 年间陷于瓦解后黑格尔面临的两难困境：这项规划深陷困境，“要么放弃绝对的循环法则，屈从当下现实；要么放弃当下内容，以此为代价，拯救绝对真理的体系。在黑格尔笔下被撕碎、被分裂的世界，不再有可能同时把握这两种极端。”(同上引, p.147) 几页过后，阿尔都塞揭示了马克思对此困境的解决之道：巴黎公社 (1871 年) 失败后不久，马克思就明确表示，无产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1] 阿尔都塞总结道，马克思找到了解决黑格尔面临问题的正确办法，因为他发现，“无产阶级就是这种隐含的普世性；它的当下阶段已经蕴含着全人类的未来与自由。它有潜力成为绝对内容的循环法则。”(同上引, p.150)

德国哲学对法国的历史事件、拿破仑帝国和巴黎公社都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在其影响下，现代社会理论现在已经不太清楚法国自身对这些事件的解读，也不明白德国解读与法国解读之间如何关联。^[2] 要想把握这些关联，理解法国社会理论的主要思潮，就必须舍黑格尔，改以圣西门及其信徒为出发点。后者当

[1] 出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所据中译为“工人阶级”，并且无着重格式。

[2] 社会学的第一个伟大时代是在大学架构之外形成的，包括了圣西门、孔德、穆勒、利特雷和斯宾塞等煌煌名姓。事实上，将这整个时代抛在脑后的过程，要比预想的更为复杂。而犯下这桩弑父罪行的，其实正是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等第一代以大学为基地的社会学家。这一段始终聚讼不已。时至今日，在圣西门主义的变体马克思主义已经整体瓦解之后，世人倒有了新的机会，重新思考社会学史上的这一时期。晚近提出的那些重构尝试中，孔德社会学里被世人遗忘的诸多主题似乎悄然回归。今天，研究孔德不仅有助于看清马克思，而且有助于领悟那些无意间借鉴了孔德观念的综合性、历史性的社会学形式。而在深刻反思乃至“否思”(unthinking, Wallerstein, 1991) 的过程中，这种新的解读还可能推波助澜，参与从整体上质疑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

即使晚近有关历史主义的考察 (Hamilton, 1996) 已经排除了孔德，重新回顾卡尔·波普和 F. H. 哈耶克在五十年前针对孔德的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展开的争论，也会有所裨益。社会学之所以捱过了攻击，就是诉诸社会学传统中那些经过转型的孔德风格的思想形式，从韦伯一直到诺贝特·埃利亚斯等论家，以及追随巴什拉尔、康吉翰、阿尔都塞等人的认识论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反思社会学的风潮中都扮演了关键性的间接角色。耐人寻味的是，今日回头评述那场争论，会发现反孔德主义者一方既主张根本不存在什么三阶段法则 (Popper, 1960, p.117)，又指出三阶段法则来源于力学 (Serres, 引自 Comte, 1975, 第一卷, p.4)。重读研究孔德的著述，显然会看出，晚近文献中对孔德法则学说的批驳纵然广为人知，却是颇成问题。这一点可见笔者此文：“Engendering the End of European History”，刊于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1996), vol. 39, pp.15—26。——原注【9】

时努力直面并应对的内容完全一致,正是后革命时期逐渐浮现的新社会的性质:社会范畴的诞生。^[3]

至于这一幕的具体背景,就是法国的第一帝国时期(1804—1815年),复辟王朝时期,后来的第二共和时期(1848—1851年),以及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0年)。1799年,也就是孔德诞生后第二年,拿破仑凭借法军在埃及和意大利的节节胜利,执掌大权。孔德的人生主要就是拿破仑时代的各项制度/机构(institutions)塑造的(公立中学[Lycée],军事化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Polytechnique],帝国及其溃败,并受到新立拿破仑民法典的约束)。这一幕中令人瞩目的是,在缺乏稳固宪制的虚空中,政治形式动荡不定,但基于新的民法典,大革命的现代化趋势依然延续不辍。拿破仑军队的战场从埃及直至莫斯科,从西班牙经荷兰到华沙,一路拓进。奥斯特里茨一战之后,拿破仑想要成为世人眼中整个西方世界的皇帝,他可不只是想再掌路易十四的权势,而是要重享查理曼大帝的荣光。但英国拒绝承认这种地位。巴黎成为幅员广袤的法兰西帝国的首都,至1811年,这个帝国已经拥有130个省,四千四百万居民,外加一些同盟国家。革命的进程以反抗等级秩序的斗争开始,到了1814年,以确立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告终,包含七万五千名新贵族的新的世袭等级业已就位。诚如晚近一位法国史学家所言,“波拿巴已经侵入了整个政治剧场,独占舞台……其实已成王朝,比旧王朝更显权势,更为专制,因为已经不再有什么中间团体能够抗衡其对平等个体的支配。”(Furet, 1992, p.234)

然而,仅在一年之内,上述一切便如一堆纸牌顷刻崩解。不过,巴黎作为帝国首都的浪漫传奇,基本上在拿破仑治下创立的新的法律框架(民法典与教育),与对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怀旧之情,都在崩解之后延续下来,进入缺乏政治宗教制度的新情境(Hont, 引自Dunn [ed.], 1995, pp.166—231)。圣西门和孔德经历了崩解一幕,见证了波拿巴主义的百日复兴(1814—1815年)。圣西门曾向皇帝如此献言:

[3] 这里的“社会范畴”,不是“social concept”或“concept of society”,而是“the social”,意指看待世界的新方式,塑造世界图景的新视角,切分世界整体的新维度,但会在许多思潮中被实体化为“社会”。本书此后直接译作“社会”,如“社会的诞生”(birth of the social)、“社会的终结”(end of the social),也由此凸显“society”的建构意味。

我恳请陛下圣鉴,接受我献给您的这部著作。我把我的重组欧洲社会计划的草案叫做《论万有引力》,因为万有引力的观念应当成为新哲学理论的基础,而欧洲的新政治体系则应是新哲学的成果。

—— Saint-Simon, 1975, pp.124—125^[4]

孔德明确表达出对政治的兴趣,并亲身参与争论,对拿破仑总是怀有敌意,只有一次短暂的例外,即百日王朝之初,一时为之振奋。圣西门与孔德创立了一门社会科学,以求解决对于大革命的后果的社会追问。在孔德看来,这就等于是探问,这场过渡结束之后,所谓常态究竟为何。玛丽·皮克林认为,对孔德来说,“归根到底,拿破仑并未能够终结大革命,因为他缺乏真正的政治教义”(Pickering, 1993, p.27),即以一门科学为基础。大革命如何能够终结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看 Hayward, 1991, pp.299—302) 如果拒绝走回头路,也不想维持现状,又不愿效仿英美模式,这些思想家就必须另辟蹊径来设问。

诚如涂尔干日后所言,孔德与圣西门之间有相当的差异:“孔德与圣西门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更清晰地区分了科学与实践……一旦有了这种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的观念,他就着手去落实,但不是出于哪种直接目的。”(Durkheim, 1962, p.146) 圣西门主义者则确立了一种特定的语言(即现代社会理论),可以说塑造了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定言者”(Logothete)^[5],即确立一种新语言的人(Barthes, 1976, p.3)。不过,巴尔特又说,“倘若定言(logothesis)仅限于确立一套修辞,那么确立语言的人无非是奠立一套体系的人……然而,要彻底确立一套新语言,却要求实行(另一种)运作:戏剧化(theatricalisation)。”(同上引, p.5) 事实上,对圣西门主义者来说,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多重戏剧化(theatricalisations, Pickering, 1997)。

[4] 中译据《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页。

[5] 参见巴尔特《萨德·傅里叶·罗耀拉》,这几位都属于定言者,在确立新语言时,会实行自我孤立(self-isolation,以滤除日常语言的“噪音”),关联—表达(articulate),规范秩序(ordering),分隔领域(theatricalization)。

二 从圣西门到孔德与马克思 ——身影湮没的中介者：巴札尔

圣西门于 1825 年去世前不久，指定奥连德·罗德里格为直接继承人，续任学派领袖，而学派也旋即发展成一个“神圣学院”。罗德里格延揽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加入该运动，他们都在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接受过自然科学训练，都是些“犹太知识青年，出身巴黎银行世家或宗教社群领袖家庭，都已融入本地文化”，但在波旁王室复辟时期的法国，他们却面临巴黎大学里新的宗教考验和宗教不宽容 (Jones et al., 1975, p.1102)。学院的组织借取了天主教的等级阶序，只是有两位“教宗”：普罗斯佩·安凡丹和巴札尔。后者于 1828—1829 年间作了系列讲课，后来称为《圣西门学说释义（首年讲演：1828^[6]—1829）》（英译本 [Iggers ed., 1972] 未能标明作者^[7]）。圣西门主义者的观念在当时蔚为流行，不容低估。1831 年，《释义》即销出五万部（有关该书赢得了何等支持与关注，参看 Carlisle, 1987, 第八章）。只要读一读巴札尔，立即就会明白，他的讲课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键性的思想资源，1829 年 2 月 25 日的一次讲课即题为“对 <6> 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所有制不断进行改造”。其第一节讨论“主人—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游手好闲者—劳动者”，二十年后，这套术语贯穿了《共产党宣言》，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一问题框架加上了一套资本学说。巴札尔的讲课或许是探讨人类“剥削”的第一套统贯一体的学说 (Cunliffe and Reeve, 1996)。

如今看来，在法国社会理论家当中，涂尔干成了巴札尔系列讲课最重要的诠释者和批评者。他指出，巴札尔将圣西门的思想整理得“富有逻辑条理，不止一个地方改变了提法，从而使整个体系展现出新的面貌……他让这些思想有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同时更加彻底地凸显出其中纯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成分……在巴札尔笔下，圣西门的思想达到了最大的逻辑一致性，得以繁荣光大。” (Durkheim, 1962, p.251) 不过也可以肯定，巴札尔的发展走向更趋近宗教范畴，与马克思截然不同。涂尔干指出，在圣西门那里已经可以发现一个核心性的历

[6] 原文误作 1928。

[7] 此书虽由巴札尔执笔，但经罗德里格、安凡丹等集体讨论，在讲授后经校订编辑而成。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依序标明以上三人合著。